



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大会 暨学术讨论会

会刊



中共党史研究会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录

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大会执行主席 胡 华	1
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 廖盖隆	3
周恩来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贡献（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胡 华	28
关于党史的几个问题（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九日）..... 廖盖隆	39
关于《中共党史教学大纲》（上篇）修订稿的若干说明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日）..... 王 洪	53
关于党史研究的问题（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于光远	68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向 青	85
辽宁省党史工作者对建国后三十年党史若干问题的讨论情况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马 云	101
党史研究也要来一个着重点的转移（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缪楚黄	108
对社会主义时期前十七年党史的简要概述（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张 弓	127
中央档案馆对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提供利用的意见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裴 桐	137
在党史研究会成立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冯文彬	144
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廖盖隆同志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151

※

※

※

中共党史研究会章程（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全体代表大会通过）.....	149
中共党史研究会理事会名单（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全体代表大会通过）.....	196
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代表名单（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197

封面设计：中国人民大学 鄂达舜

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 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

大会执行主席 胡 华

同志们，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现在开幕。

今天出席大会的全国各地的和在北京的代表，共二百五十一人。列席旁听的同志，六百多人。

出席今天大会的，有我们党的老革命家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曾三、吴亮平、舒同、徐彬如诸位同志。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还有我们党史界的老同志李新、廖盖隆、马齐彬、王实、董谦等同志。

胡乔木同志说，因为最近赶一个任务，同时身体也不好，所以这次大会他不能出席了，向同志们表示抱歉，以后有机会再和同志们见面。

冯文彬同志因今天有会，所以照像以后回去了，过两天有时间，他来出席大会讲话。

我们对中央和党的各位老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代表大会筹备组，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特别是从西藏、新疆、青海、云南等地远道来京的代表，表示热情的欢迎。

还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志敏同志，湖北省王韵雪老大姐，很热情的远道赶来参加我们的大会。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奎璧同志给大会发来了贺电，我们深表欢迎。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很重视党史研究工作。近四年来，同志们为恢复党史本来面目，发扬光荣传统，总结历史经验，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八月，黑龙江省和旅大市建立了党史研究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全国性的党史讨论会上，发起成立党史学习研究会。一九七九年一月在湖北省，二月在天津市，四月在吉林省，相继成立了党史研究会。到今年六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已正式成立的党史研究会有二十二个。成立了党史研究会筹备组的有十个。总共有三十二个单位。

去年十二月，在武汉召开了为筹备成立全国性的党史研究会的筹备会议，建立了筹备组，得到了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和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经过半年的筹备，使我们这次大会得

以顺利召开。

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三十二个党史研究会或筹备会，向大会报来的团体会员共七百四十个单位，报来的会员数字，共四千六百四十五人，还有一些团体会员，尚未报来数字，约计一千多人。总共约计已有会员六千余人。

这次大会收到论文八十余篇。

各单位报来的党史研究规划，包括党史专题研究、人物传记、根据地史、资料汇编、教材编写等五个方面，共二百五十个项目。

这次大会预计进行八天，包括学术报告，通过会章，选举理事会，讨论科研规划，进行学术交流等议程。我们特别要为庆祝党的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制定具体的规划。

我们这次大会得到了首都许多单位和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解放军政治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给大会提供了车辆，总政话剧团将为大会义务演出表现党史的话剧《一代英豪》，北医、人大等院校和部分同志积极参加会务工作，空军招待所也给我们很大帮助，我们一併在此致谢。

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是党史界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盛会。让我们在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路线的指引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为迎接党的十二大和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为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作出更多的贡献。

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建设 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

廖 盖 隆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举行的，到现在差不多是整整五十九周年了。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最初成立的一批小组算起的话，那就是六十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宣布党史研究会的成立，同时举行党史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这样的日子里来学习六十年来党的历史经验，认识我们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并且展望我们正在走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无疑是很有益处的。我今天讲话的题目，就叫做“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我分为下面十个小题目来讲：（一）学习党的历史经验有什么意义？（二）六十年的党史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三）第一个三十年走了一个“之”字路；（四）第二个三十年又走了一个“之”字路；（五）关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和争取长期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六）关于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的国内形势；（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八）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九）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建设；（十）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党的建设。

一、学习党的历史经验有什么意义？

一谈到学习党史，学习党的历史经验，人们通常就要问：什么是党史？什么是党史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可以说，党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党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换句话说，党史就是党领导人民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经过曲折的道路，取得胜利和成就的历史。六十年的党史，就是党领导人民战胜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以及自然界的敌人的生动丰富的历史。

同时，党的历史又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取得胜利和发展的历史。这是因为六十

年的党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是党按照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按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领导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取得胜利和成就的过程。

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经过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就因为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因为党日益正确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因而在政治上、理论上日益成熟。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党能正确地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的时候，党就能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能取得胜利和成就。凡是不能正确地结合，因而在行动中违反客观规律的时候，党的事业，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但是挫折和失败终于教育了我们党，使我们能够逐步实现理论和实际的正确结合，因而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和成就。

再次，党史又是党本身的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党是有马列主义武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有自觉纪律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必须具备这四个条件，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去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和成就。但是，党不是一成立就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党是经过了长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才造成了这样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的。

拿头一个条件，即有马列主义武装这个条件来说，党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才实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才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就是按照中国的条件具体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毛泽东思想命名的党的理论体系。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党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作风和革命风格，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党的自觉纪律。正因为这样，党才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但是，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党又面临着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的崭新的任务。这是一个新任务，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的党以前没有作过的。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党又一次经历了实现理论和实践正确地互相结合的艰苦曲折的道路。党是在经过建国以后头七、八年的胜利，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到六〇年的失误，再经过一九六一年到六六年的恢复和发展，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动乱和失败之后，才逐步地比较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的。正因为这样，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才重新确立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而由于党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党正面临着一个恢复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恢复党的战斗力的艰巨任务。

党的历史又是正确地发展党内斗争和不断地增强党的团结的历史，这是党本身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历史经验证明，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的新旧矛盾的反映。这种斗争就是党内斗争，有时表现为党中央内部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党是由于不断地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克服“左”的或者右的错误倾向，而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说过，对无产阶级来说，最好的学习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开展必要的党内斗争，正是为了不断地

增强党的团结。党就是在又对立又统一、又斗争又团结的运动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党内斗争的历史不是党史的全部，也不是党史的主体，但这是它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党的建设和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正确地处理党、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人物和群众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先锋队 and 群众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党的民主（包括党内的民主和党在对待非党群众的关系中实行的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实行正确的集中，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的基础；党的领导必须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党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始终是群众。

党史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活动的历史，不是领导者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历史。但是党的这些领导者是党的领导集体的一员，他们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活动，也是党史的一部分重要的内容。党史应该实事求是地记载和说明党的领导人物的历史功绩和他们的错误，以便于后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或者说毛、周、朱、刘）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仍然健在的老一辈的革命家，都应当在党史上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但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是群众，包括党员群众和非党群众。党的杰出领导者们的重要作用，在于，而且仅仅在于，他们是代表了群众的利益，执行了群众的意志的。

弄清了什么是党史以后，我们就懂得研究和学习党史的重要的意义了。

既然党史主要就是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那末，研究党史就能使我们学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历史经验，就能用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我们自己。

既然党史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胜利和发展的历史，党史就是运用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那末，研究党史就能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懂得怎样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就能使我们具有广阔的政治胸怀，和具备对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强的信心。

既然党史又是党本身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是正确地发展党内斗争和不断地增强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增强党的战斗力的历史，那末，研究党史就能使我们学到党的建设的丰富的经验，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使我们懂得必须不断地学习和进行自我改造，善于用民主的方法进行党内斗争和增强党的团结，就能使我们大大加强自己的政治责任心和政治警惕性。

既然党史的经验证明，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是党的根本原则，依靠群众和走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那末，研究党史就能使我们懂得党的前进和后退，胜利和失败，都是同我们党是否能坚持发扬民主和加强党的纪律，是否能坚持党的民主制度和集体领导原则密切相关的；就能使我们懂得党的建设和发展的这些根本规律，就能促使我们为这些根本原则和根本路线的贯彻实行而斗争。

二、六十年的党史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

现在让我们对党史作一个宏观的考察，看看六十年党史的轮廓是怎麼样的，党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是怎樣的，党的基本历史经验又是什么。

从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来看，六十年的党史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即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下编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上编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因为五四运动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它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好是三十年。下编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也刚好是三十年多一点。总而言之，六十年的党史可以分为两大段、两个三十年来研究。两大段是两个不同的革命过程，这两个过程又是互相衔接和彼此密切联系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个革命过程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是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两个发展阶段。

很明白，虽然我们党已经经历了六十年的长过程，中国革命还是没有完成的。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党、无产阶级解放世界人类的历史使命更是远远没有完成的。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还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工农之间的本质差别还存在，阶级还没有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要从不成熟发展到成熟即是达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达到消灭阶级，就要进行长期的改造和长期的建设。

拿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来说，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去年国庆节讲话中所指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经过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就是说，一个叫做初级的现代化，一个叫做高级的现代化。已经过去的三十年，再加上今后的二十来年，就是在五十年左右时间内，到本世纪末为止，我们还只能实现初级的现代化。所谓初级的现代化，就是如同邓小平同志今年一月十六日《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所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一千美元的“小康社会”（就是马马虎虎，生活可以过得去，叫做“小康社会”）。要多少时间才能实现高级的现代化呢？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的报告都没有说。据我看，从二〇〇一年算起，恐怕还要经过五十年，就是从革命胜利算起，总共要经过一百年的努力，到二〇五〇年为止，才能实现高级的现代化，即达到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在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到那时，大概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完全建成，工农之间的本质的差别已经消灭或者接近于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接近于消灭，体力、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将大大缩小，剥削阶级的残余和阶级斗争也将不再存在，而达到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从那时，即从二〇五〇年以后，还要经过经济文化的长期的发展，经过思想觉悟的大大的提高，再加上国际条件的配合，才能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到达大同社会。由此可见，我们党今后要走的路比较过去已经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多少倍。我们研究六十年的党史，学

习党的历史经验，正是为了使我们的党更好地向前迈进，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更顺利和更迅速地发展。

这些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的党史教学，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尽管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六十岁的青年了（我所以说党还是处在青年时期，是因为党的生命比较一个人的生命恐怕要长得多，大概要活几百岁、上千岁，而且我们党现在正处在充满青春活力的时期），可是我们还没有一部党史，因此党史的教学也就没有可以作为正式根据的材料。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在去年七月间，主持编写了一部高等学校党史教学大纲，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的头一件工作，就是帮助修订这个教学大纲，使它成为进行党史教学可以作为依据的统一轮廊。这个任务是胡乔木同志在今年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来，并且得到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同意的。胡乔木同志认为，原来的党史教学大纲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只要作一些修改就可以使用。胡耀邦同志认为，这个大纲的缺点就是，只写到一九五六年，他建议应当一直写到现在，写到一九八〇年，就是把后面二十几年的党史补全。会议上经过讨论决定，党史教学大纲的民主革命阶段部分，由原编写小组同志负责修订，社会主义阶段部分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负责编写，然后讨论修改定稿。

今年四、五月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下，对党史教学大纲的前三十年部分，作了逐章逐节的讨论，考虑了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修订的方案。以后，由党史教学大纲的原编写小组的部分同志和一部分高等院校的党史教师，根据上述方案和修改意见对教学大纲作了修订。这就是作为党史教学大纲的上编打印给同志们的这个小册子。不晓得这个小册子发给大家了没有？希望同志们对这个修订过的党史教学大纲继续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以便今后作进一步的修订。至于党史教学大纲的后三十年部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虽然也写出了初步的草稿，但是需要等到今年底十一届六中全会就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定以后，才能够修改定稿。因此，估计党史教学大纲的下编，要到明年初才能够印发使用。

三、第一个三十年走了一个“之”字路

在修订过的党史教学大纲中，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党史是分为五个部分来叙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党史，也要分为五个部分、五个时期来叙述。党史的分期不是随便这样分那样分都可以的，分期是有个客观标准的。党史分期的客观标准，就是革命发展的阶段性的变化，是革命的阵线和革命的直接打击对象的变化，这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最激烈的矛盾）的变化的，或者是反映了由于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或者错误，而使党的历史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的变化（例如，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党史的阶段性的变化，就是这样。这个时期为什么分出来呢？因为那个阶段党的路线不正确，例如“文化大革命”，就要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正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说，党史不应当是历史事实的杂乱无章的堆积，而应当是反映有规律的、分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有条理的叙述。这种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具体实践日益正确地结合起来的。由于这种正确的结合是曲折地向前发展的，党的事业，革命和建设事业，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艰难曲折的道路。

修订过的党史教学大纲，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单独作为一章。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问题是需要专门考察的，还因为产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也就是党据以制定正确的活动策略的基础，是需要专门仔细分析的。五四运动为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所以这一章要从五四运动写起。不过就一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来说，还应该远溯到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因为从那时起，中国就逐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那时以后，资本主义也在我国开始发展了，不过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很落后的。在解放以前，中国工业的产值在世界上只占第三十几位，如果按人口平均，那就更加落后了。革命前的俄国虽然也称为落后，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的工业产值还占世界的第五位。不过，虽然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中国社会还是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这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新式的知识分子。在这些社会力量的参加下，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就为了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更加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历次斗争，包括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一九一七年发生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列主义传播到了中国。这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召开的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了党的成立。但是正象呱呱坠地的初生婴儿一样，那个时候的党还是很幼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差不多是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主要就是说，我们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那时候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写的文章和通信，说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一般的原理。至于中国革命当时是处在什么阶段上，革命要怎么搞，采取什么方法，当前的革命目标和革命性质是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解放。一直到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党的“二大”，才提出了党的当前反帝反封建纲领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严格地说，党的成立的过程，恐怕要算到党的“二大”及其以后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惨案发生时，这个工人运动高潮才被镇压下去）。

接着的是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史的这个部分，可以从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说起，因为“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促成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的改组，为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和有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准备了条件（这里讲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五卅”运动以后的革命高潮，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七月革命失败为止）。直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国共最后分裂和革命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宣告失败，这个时期才宣告结束。

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是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还没有统一的了解的党。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党在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方面，也开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而懂得当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次，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例如

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都致力于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致力于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著作，就集中地代表了党在这个时期的理论成就。一九二五年末，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合的专政的这个政权的观点，就是我们党的理论成就的集中表现。可以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我们党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萌芽时期，开始有了萌芽了，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已经有了（比如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个基本的思想已经有了）。但是这个理论体系或者说思想体系这个时期还没有产生、还没有形成，只是萌芽，还没有形成。因为适合于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个时候还没有找到。如果硬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就已经产生，我们党的理论体系就已经形成，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即我们党的理论体系，是下一个革命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产生，开始形成，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比较完整地系统地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和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同志们可以去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陈延年等等许多同志，都坚持了正确的意见，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斗争，他们都是有贡献的。但对这个贡献也不要夸大，不能说在我们党内当时就已经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正确路线，比如说形成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内部同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互相对立。不是的，这样的正确路线当时还不存在。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的党还是幼年的党。

民主革命阶段党史的第三部分，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算起，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止（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作的《如何研究党史》的讲话中，就建议要这样分期），或者是按照习惯的分期法，那就是仍然算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为止。这一章党史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彭德怀、方志敏、贺龙、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下，开始独立地领导革命和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并且开始找到在农村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逐步壮大革命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的革命道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后来写到一九五七年朱德同志在建军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上的那个意见，就是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反第三次“围剿”胜利的期间，毛泽东思想的雏形，以毛泽东同志为集中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了。但是当时，这条正确路线还没有为全党所接受，特别是受到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反对和排斥。其结果是招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败，使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少到三万人，使总共有二千多万人口的十几块根据地，减少到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一小块根据地；而白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在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支持下，才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尤其是毛泽东，总结

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时期中，还比较完整系统地形成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包括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理论，以及人民战争的理论和一整套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大大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发展到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人民军队的数目也发展到一百多万。这就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九年十月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外来的干涉，对反革命势力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决战并取得全国胜利的时期。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历史上一次最壮丽的最光辉的日出。它改变了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为整个世界带来了新的光明前景。

总起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党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一方面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方面，党又探索了和找到了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党在这个阶段，走了一个“之”字路，就是说经过了两个曲折，即经过胜利和失败，再胜利再失败，这以后才达到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个阶段，党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即按照中国的条件具体化了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主要是依靠建设一个具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的党，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和正确地进行人民战争，依靠一个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同时，党也开始探索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规律，开始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在长时期中，党形成了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的革命民主传统，这是党的根本路线。这些根本经验，在今后长时期仍然适用，甚至可以说是永远适用的。

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小题目，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的一个轮廓。

四、第二个三十年又走了一个“之”字路

党史的下编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更正确地说应该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这是党史的第二个三十年。这个三十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来研究。这五个时期就是：（一）巩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时期，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的三年；（二）社会主义改造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四年；（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严重失误和调整国民经济时期，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和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期，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五）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的新时期。

社会主义阶段党史的第一个时期是巩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包括建国以后的头三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我看

来，光讲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恐怕还不够，这只要拿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胜利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来作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中国革命都不仅不比俄国十月革命差，而且远远胜过它。就是说，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比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更大更巩固的。因为，第一，任何革命的基本问题都是政权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解决了。而且这个无产阶级民主政权一建立就是很巩固的，这和十月革命大不相同。俄国十月革命是在中心城市起义胜利夺取了政权以后，进行三年的内战，才在战场上分个胜负的。而我国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在三年解放战争胜利、彻底打败了敌人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二，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的人民政权没收、接管、改造了二千七百多个官僚资本的大企业，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也和十月革命以后因为一下子宣布没收几百万家私人工商业而造成的混乱情况大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个胜利至少比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更大。从那时候起，党的工作重点就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由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阶级力量对比上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从这时候起，改造整个社会的任务就能够主动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以和平的方法进行了。因为我们手里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怕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和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在这三年内，我们迅速地顺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附带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进行了正义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准备好了大规模地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

第二个时期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进，而且又以建设为中心和主体的理论和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的。党在自己所不熟悉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基本上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因此在这两方面的工作中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党进行的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在这个时期的末尾，党的“八大”正确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规定了战略的转变，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正确路线（这个路线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在成功中间就没有缺点。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都开始出现了工作比较粗糙、比较急躁的倾向，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上，解放以来也长期存在着“左”的偏向，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在这个时期胜利和成就无疑是主要的。

第三个时期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严重失误和为纠正错误而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八大”结束以后，党为贯彻“八大”的路线，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一九五六年底和一九五七年初，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正确地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提出了我国主要

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指出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列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重大发展。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党中央都在认真地贯彻执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包括“双百”方针。党指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要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要整顿党的作风和在人民群众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所有这些方针，到现在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如果现在回过头去学习那个时期的党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的一些重要的社论的话，我们就会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有些情况同现在是相似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相似的；社会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思潮，这也是相似的；但主要的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这也是相似的。但是从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起，看起来党的领导人是把一些错误的思潮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原来曾经正确地估计过那种思潮的作用程度，说那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一个很小的风，把池塘里边的水吹皱了一点，可见这个风是很小的了）；但是不久，就把那种大概是一、二级的风，看成是匈牙利事件迫在眉睫的十二级的台风了，因此就认为我们必须来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其结果是把五十五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实际上是不是那个情形呢？当然不是没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是的。跟现在一样，这种思潮是有的，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在也是有的。但是，是不是他们能造反、能夺我们的权呢？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候我们尚且不怕它造反，民族资产阶级正在被消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极少数的右派分子，他们说了一些反对我们党的话，我们就应当怕他们造反吗？就非要搞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不可吗？看起来没有理由说必须那样作。当然，批判这种错误思潮，对人民进行教育，是必要的；现在对错误的思潮也仍然需要加以批判，但是不应当搞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因为那样做，又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去了。其次，打击右派分子的分量太重了，而且是严重地扩大化了（说是严重地扩大化，是因为被划的右派分子中间现在大约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七到百分之九十九是改正了的，就是说97%以上都划错了）。不应该采取划分子、戴帽子的办法，更不应当扩大化。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梁漱溟是一个右派分子，他有的时候骂共产党，批评共产党，我们就只限于批判他的错误思想，使他的错误思想在人民中间没有市场，而没有给他戴过什么右派分子的帽子。他是真正的右派分子，可是没给他戴帽子，也过来了。采取这种办法不是很好吗？不管怎么样，鉴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犯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我们的党中央现在和今后决不会再发动反右派斗争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错误的严重后果就是在于，他打断了我们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发展，因而挫伤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运动中沒有经过法庭的审判，不需要任何确凿的罪证，就武断地给数以几十万计的人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或重罪，这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法制；但是更严重的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创造了一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就是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来整人，并且不容许说理和伸辩，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以后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就被广泛地使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这种方法使用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工作中间去，比如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民主补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运用“四大”的方法来强制推行的。当然，一九五七年夏天起反右派斗争的“左”的错误，还是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还不是全局性的、影响到党的全部工作的错误，一九五七年全国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

但是一九五八年党在“大跃进”的经济建设运动和人民公社化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错误，特别是由于这些运动都是运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四大”方法来强迫推行的，由于这些运动影响了和囊括了党的全部工作，这种“左”的错误，就不能说不是全局的错误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底察觉了工作中间有“左”的错误（不过又把这种错误说成只是执行中的、个别的、暂时的错误，还是轻描淡写的）。以后，曾经着手去加以改正，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但是这些错误还远远没有改正过来，又在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不适当地进行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使“左”的错误发展得更加不可收拾。在反右倾的斗争中，把庐山会议的一场斗争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说明阶级斗争不仅扩大到了人民内部，而且扩大到了党内。于是就造成了使人民付出了很大牺牲的一九六〇年到六二年的“三年困难”。当时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曾经是使困难加剧的因素，但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因素是当时党的领导的“左”的错误。

从一九六〇年底、一九六一年初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正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来克服困难纠正错误。这以后，特别是从一九六三年起，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轨道。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左”的错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反右倾斗争的错误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纠正，但是反右派斗争的错误，虽然已经提出，却没有纠正。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号召发扬民主和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可惜，“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没有得到清算，错误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改正，更不能避免重犯，反而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阶级斗争的错误的理论观点。一九六三年起又在这种“左”的理论观点的指导下开展了“四清”运动。虽然这种“左”的错误还是局部性的，进行“四清”的农村只占全国农村的三分之一左右，还没有影响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全局。一九六五年一月制定的《二十三条》，一方面，对于纠正“四清”运动中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走资派”这种不科学的概念，并且把建国以来十五、六年来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错误地概括为就是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认为这就是纲，要抓住这个纲，这就使得“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二十三条》提出那些理论直接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

党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左”的错误，也就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已经作了结论。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错误，进行十年反革命的大破坏，给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了一场大灾难。这个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从反面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对于这个教训，去年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已经作了初步的基本的总结。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来，是拨乱反正，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粉碎“四人帮”以后，首先是进行揭批查的斗争，同时立即着手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破坏推到了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一九七七年八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大”在基本点上是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但是从理论，路线的拨乱反正方面来说，还有待于后来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将要在今年底举行的六中全会去完成。从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我们的党中央恢复和发展了自己在“八大”和“八大”以前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可以说，三中全会以来的时期，是党的路线最正确的时期。除了解决路线问题以外，党中央又致力于解决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由于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党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巨大的辉煌成绩。

总起来看，在第二个三十年中，党又走了一个“之”字路，就是又经过了两个曲折，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才终于开始比较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发展规律。摆在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并且要改革、完善和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上层建筑。要实现这些任务，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的基本点，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是在坚持这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领域，都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在下面，我们将要详细说到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从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党中央在总结六十年来的基本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党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党本身的建设的纲领。

五、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争取长期和平 建设环境的可能性

当着世界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国际形势的发展有趋于紧张的一面，即存在着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一面，但总的说来形势很好。

先从紧张的一面来说，苏联在七十年代取得了在军事力量上同美国大体势均力敌的地位（在战略武器方面同美国大体相当，常规军备方面却占了优势），紧接着苏联就采取进攻的姿态去争夺世界霸权。这十年（指七十年代）就是以苏联的扩张侵略为特征载入史册的。特别是七十年代中叶以后，苏联在非洲多次发动了由古巴人充当代理人的侵略战争；在中东，是在阿富汗、南北也门搞颠覆和谋杀，在伊朗是浑水摸鱼，最后是在阿富汗实行武装入侵；在东南亚，是在印度支那取代了美国的地位，假手于越南人侵略老挝、柬埔寨，威胁中国和东盟国家。非洲、中东、东南亚，再加上加勒比地区，这就是苏联南下夺取世界霸权的四个爆发激烈冲突的地区。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争夺非洲、中东，就是为了争夺欧洲。因为非洲和中东是欧洲的侧翼和外围。另外两个地区苏联的攻势是为了牵制美国、中国、日本的反抗力量的。苏联的扩张侵略不可否认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反抗仍然不够有力；它们的联合

不够紧密；而且还有一些人倾向于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采取绥靖政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战争的因素正在增加，而战争的威胁是来自苏联。这是世界形势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但是总的说来，世界形势的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世界的侵略和战争势力同反抗这种势力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这个新的格局就是中、日、美、欧一条线，加上第二第三世界一大片，开始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反对侵略和战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个新的世界战略配置，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七十年代初叶到中叶就预先设想到了，并且由他们亲自奠定了基础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三年春一次接见外国客人的谈话中间，明确地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概念，当时毛泽东同志讲的“一条线”是讲地球的纬度，从中国经过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到美国、到日本形成一条线，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他当时的话是说反对一个王八蛋。组成一条线，共同反对一个王八蛋。接着又在一九七四年接见另外一个外宾的谈话中间，又提出了“一大片”的概念。就是说中、日、美、欧、加上第三世界一大片要团结起来呀，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四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的论断，实际上就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战略的。三个世界作为一种理论，不一定非常完善，而且情况有了新的改变。但上述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无疑地是一个事实。从七十年代中叶以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实现中美、中日的关系的正常化，并且发展了同日、美和西欧国家的关系。后来，经过克服“四人帮”的阻挠破坏，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党中央一九七七、七八、七九年的努力，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终于开始成为事实。同我们一起为实现这个联合战线而共同努力的，有美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日本的田中、大平以至福田，以及西德、英国、法国的许多政治家。我们特别注意到基辛格最早提出的世界多元化和五大力量的概念，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两个超级大国所能够操纵和主宰的了，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美国、苏联、中国、日本、西欧五大力量的组合。作为现实的政治经济力量来说，五个力量的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五强可以决定一切，全世界四十亿老百姓算不了什么，那就是错误的了。决定世界命运的还是全世界的人民群众。不过总的说来预见到这个世界战略的变化，并且在组成新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认为，世界形势的这种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这种格局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演变的结果，是六十年代世界上的各种力量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结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国家大都采取了一些内部改良的措施和互相协调的措施，在战败国的德、意、日则又推行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化，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并实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缓和了经济危机的剧烈性，使之变为比较频繁但又比较轻微的中间性危机。美国在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失败以后就在走下坡路，经过了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的发展，终于变成了采取守势。另一方面，苏联已经从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并且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这攻势终于造成了一个对立面，这就是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